

忆何林

朱维之

我和何林同志为君子之交共三十六年。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，我和何林同志都被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来。他从北京来，比我早到两个多月，是系主任。我从上海来，人生地疏，高教部跟我接洽的洪久同志向我介绍了南开的情况，特别提到李何林和李霁野等同志，告诉我，到南开并不会寂寞。民盟中央的同志也向我介绍了何林同志，得知他的爽快直谅的性格。我到校之后，打算第二天就去见何林同志，不料他在当天晚上就先来看我了。听到剥啄一声，我马上去开门，只见一位中等身材，衣冠整齐而精神饱满的同志站在门口。不等我开口，他便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李何林”。我们一见如故，谈得很合拍。我把民盟中央同志的话告诉他，他知道我也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时，十分高兴，觉得多一层同志的关系，当能更好到地合作。他的话干净利落，把中文系的简史、师资情况、课程设置等情况介绍之后，很快就谈到我的具体工作，依照我的愿望，作了妥善的安排。这一简短的会见，便显示他的性格和为人，没有架子，没有官僚主义，没有虚伪的客套，对人真诚，办事利落，说话不噜苏而讲求工作效率。

我未到北方来之前，在上海早就知道李何林这个名字，主要是由于他的著作《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》（1940 年，生活书店出版）。这书之所以能引起我的兴趣，是因为跟我有同好。1926-1927 年之间，我还是学生的时代，曾写了一篇《十年来的中国文学》发表在上海《青年进步》月刊的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，虽很幼稚，也可算是我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历史性总结的文献之一。1939 年，我发表了《中国文艺思潮史略》（先后由长风书店和开明书店出版），虽不够成熟，详尽，但也算是最早专论我国文艺思潮史的专著之一。在 1940 年以后，见到何林同志的这本辉煌巨著，觉得分外高兴，引为同好：一、都做过新文学运动历史小结的工作；二、都注意到文艺思潮史的发展。不过他和我的侧重点不同，他侧重在政治社会的变迁和文学思想的斗争史等文学外部的研究；我所侧重的是创作方法和风格等文学内部的研究。

其次，关于古典、浪漫、现实等流派或主义在中国近代发生与变迁的时间，我们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欧洲从十八世纪以来二百年中文艺思潮变迁，都反映在我国“五四”以后的二十年中，但有程度和性质的不同。我却认为：宋元以来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发芽而缓慢生长的时期，这些思潮在中国和欧洲的发生、发展，几乎是同步的。从十四世纪，即元末明初，开始盛行古典主义，直到十六世纪的明末，共约二百年。浪漫主义思潮盛行时间较短，只在明清之际，就是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一百多年间风行。现实主义则是从清以来，则从十七世纪至今，将有三百年的历史了。现实主义是世界文学的主要流派，其间又有各种不同的区别，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。

关于这些不同看法的问题，在我们共事的三十六年中，该有充分的时间来交换意见，必

要时还可以争论一番。但是，这三十六年的宝贵时间多半花在政治运动、学习、斗争和批判中，连备课的时间都不够，谁还有闲情逸致来重提自己过去的旧作呢？并且为我来南开大学后，第一年参加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教学工作，第二年因为现代文学教研室人手不足，在何林同志的多次劝说下转到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，第三年又因教育部的新规定，中文系要添一门“外国文学”课，我便受托负起这个新的任务，三十四年来一直和外国文学打交道。况且，我们这些解放前出版的旧作在大陆上都停止印行了；在“文革”中，我们同受打击，只有受批判的份，哪有讨论的份？

在拨乱反正以后，何林同志的《今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》于1981年在西安重新出版了，我的《中国文艺思潮史略》也于1978年被香港青年出版社原版重印。据读者反映，说是有启发性，只嫌太简略了，希望能充实些。于是我在1985-1986年间抽空把它重写一过，字数增加了三倍半。1988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；正可与何林同志详细商讨时，他却撒手去了，真是遗憾。

回忆过去三十六年中，我曾和何林在同一教研组，一同上课，互相听课，互提意见；一同学习、讨论、一同下乡搞“四清”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一同指导可爱的农村小青年们学写文章，一同受“四人帮”的打击、迫害，一同打扫厕所，一同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我亲眼看见他在工作中表现的直爽的性格，亲眼看见他如何对系里行政事务的认真负责，对同事们的生活、学习、思想等各方面的关怀，也看见他如何争取入党，如何作思想上的斗争。处处表现他的认真、爽直性格，甚至在患难中也保持这个可贵的性格。例如在学生宿舍里打扫厕所时，他也一丝不苟地把积垢很厚的便池擦洗得洁白精光，有些便池变得全黑了，积垢非用刀刮不掉，我们又不许身带刀子，他便用拇指甲去抠，把黑便池抠白之后，还加以欣赏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还敢于提出意见，说爱护公物，讲求公共卫生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。听见这话的几个学生较为通情达理，他们不做反应，那就是默然承认何林同志的认真爽直。

何林同志去了，他的性格和事业永远留在后一代人的心中。

1989年元宵节

（注）『李何林先生纪念集』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）所載。